



《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互文性及其启示

肖淑芬

摘 要：托妮·莫里森的《宠儿》(*Beloved*)与哈里叶特·比彻·斯陀的《汤姆大伯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之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主要表现在故事的起步、核心、关键、线索等四个层面上。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女性作家共同的文化基因使然。莫里森与斯陀夫人笔下的文本关系,为互文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视野。

关键词：《宠儿》;《汤姆大伯的小屋》;互文性;启示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小说《宠儿》(*Beloved*)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并被视为美国黑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关于《宠儿》的研究很多,但至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宠儿》与哈里叶特·比彻·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小说《汤姆大伯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互文性这一术语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蒂费纳·萨莫瓦约在其《互文性研究》一书中将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及其多种界定作了梳理。这里,笔者将主要的几位言说者的表述列表说明,见表 1。

表 1 “互文性”的相关表述

论者/论著/时间	表 述	贡 献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封闭的文本》/(1967)	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	提出了这个术语
菲利普·索莱尔斯/ 《理论全览》/(1971)	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	强调了互文性的作用
罗兰·巴特/ 《大百科全书》/(1973)	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	强调宽泛性
杰拉尔德·普林斯/ 《叙事学词典》/(1978)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	注重文本间性
吉拉尔·热奈特/ 《隐迹稿本》/(1982)	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	强调互文的具体性
麦克·里法特/ 《诗的符号学》/(1983)	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的领会,无论其他作品是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存在 ^①	将互文性引到了读者接受的层面上

① 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50 页。

十分明显,互文性的研究,打开了单个文本封闭的围墙,主要注重了下面几种关系的研究:其一,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共存关系与派生关系,如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与英国大学才子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及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之间的共存关系与派生关系;其二,此文本与自身之外的文本群的吸纳、引用关系,如艾略特的《荒原》与《从祭仪到神话》和《金枝》等作品的文本群的关系;其三,此文本对文学史的记忆关系,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文学史上的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关系;其四,读者在阅读此文本时对隐含文本的寻觅,如读者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对其“神话模式”的探寻,等等。说穿了,互文性的关系即是“我中有你的关系,或曰此中有彼的关系”^①。

二

表面上看,《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之间,除了反对种族歧视的主题有共通性之外,是两部互不相干的作品,叙述手法各异,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可谈;但是,如果走进这两部作品的文本深处细细品味,便会发现,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相像,其间蕴涵着明显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在:

其一,故事的起步——都是从一个“开明的”白人庄园主的败落说起,他们的经济危机毫无悬念地都转嫁到庄园里的黑奴身上,于是,黑人们的“家园”破散了。

其二,故事的核心——逃亡的线索中都是书写一个年轻的母亲带(怀)着孩子的绝处逢生。

其三,故事的关键——在女黑奴艰难逃亡而濒临绝境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个男人对她的救助。

其四,故事的线索——都平行地铺设了两条线索,一条写女黑奴艰辛的逃亡,另一条写男黑奴的忍辱并被转卖;两者也都同样地赋予了女黑奴逃亡的这条线索以异常的光彩。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文思百变的文坛上,莫里森与斯陀夫人这两位女作家为什么会有上述如此这般的互文?人们或许会想到该做一番“影响研究”,即莫里森如何受到了斯陀夫人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生活在美国这同一片土地上的作家,莫里森对斯陀夫人自然不会陌生,但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她不会刻意地去邯郸学步的。仔细推敲一下,她们的文本互文,并非缘自技巧层面的影响与借鉴,而是缘自思想上的共鸣。如果我们向更深的层面透视,便会发现,这两位女作家文本互文现象的产生是根植于由女性生存历史而形成的女性集体无意识之中。

尽管要想将女性生存的历史与男性做全方位的、整体的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有几个维度的抽样比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是支撑莫里森与斯陀夫人文本互文关系生成的重要因素。这便是:活动空间、生理制约、历史角色、社会定位等。其具体的差异见表 2。

表 2 两性历史生存状况抽样比较

	活动空间	生理制约	历史角色	社会定位
男 性	世 界	自 由	强 者	中 心
女 性	家 庭	孕 产	弱 者	边 缘

上述抽样比较,虽然只显示了几个层面的差异,却是有代表性的。显然,家庭、孕产、弱者、边缘已经成为女性生存历史中的典型处境,或曰女性生存的“原型”,并且经由漫长的历史已成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如荣格所言:“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②可以说,女性作家在观察与言说世界的时候,必然在“本能驱力”下表露出女性生存的“原型”。莫里森与斯陀夫人的写作正是基于家庭、孕产、弱者、边缘等女性生存的“原型”而在其笔下出现了家庭视域、“母”性情节、弱者心态、边缘抗争等共通性,这便是她们的文

① 杨 肖:《从蒋天佐的译作谈翻译文本的互文性》,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② 荣 格:《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第 90 页。

本出现互文性关系的重要原因。

三

前文所言的四个层面的互文关系，在两部作品中是有据可查的。

第一，故事的起步。两部作品的第一处互文是，故事的起步阶段都出现了一个“善良的”庄园主，即庄园里的“家长”，此“家长”在经济上的败落导致了黑人们“家园”的破散。

斯陀夫人给《汤姆大伯的小屋》第一章起的题目就是“本章给读者介绍一位善人”。文中说：“谢尔贝先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为人和蔼可亲，待人接物颇为宽厚。他庄园上的黑人从来没有在物质生活方面感到什么匮乏。然而，由于他大量地、无节制地做投机生意，结果弄得债台高筑。”^①显然，斯陀夫人笔下的谢尔贝是一个温和地对待黑奴的“善人”，是个“和善”的大家长。随着这个“和善”的家长境遇的变坏，庄园里的黑人们便纷纷地被卖掉了。

莫里森与斯陀夫人不谋而合。在《宠儿》中，名为“甜蜜之家”的庄园里最早的庄园主加纳先生也是一个“善人”。作者对他没有做直接介绍，而是通过小说中的老黑人贝比·萨格斯的感觉以及她与这位“善人”的对话来表现其“和善”的。先看贝比·萨格斯的感觉，她刚被卖到“甜蜜之家”时便对主人加纳有了这样的好感：“加纳夫妇施行着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对待他们像雇工，听他们说话，把他们想知道的事情教给他们。而且，他不用他的奴隶男孩们配种。从来不把他们带进她的小屋，像卡罗来纳那帮人那样命令他们‘和她躺下’，也不把他们的性出租给别的农庄。这让她惊讶和满意”^②；再看她被儿子黑尔从加纳那里赎回后与这个“善人”的对话：“你在‘甜蜜之家’呆了多久？”“十年，我想是。”“挨过饿吗？”“没有，先生。”“受过冻吗？”“没有，先生。”“有人碰过你一个手指头吗？”“没有，先生。”“我让没让黑尔赎回你？”“是的，先生。你让了。”^③但“甜蜜之家”的这个“善人”死了，一个残酷的庄园主来了，于是，像《汤姆大伯的小屋》中的情节一样，黑人们纷纷地被卖掉了。

斯陀夫人起笔于“家园”和一个“和善”的大家长，莫里森的起笔也异曲同工，显然，“家”与“和善”的家长是这个层面上互文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她们都如此关注“家”和如此厚爱“和善”的家长？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④由于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处于弱势地位，活动的空间被高度挤压，只剩下家庭这个十分狭小的范围，故女性思想中关于世界的影像是淡漠的，家庭的印象则是深刻的。家庭视域很容易把女作家的视线在创作的第一时间引入“家”中。同时，既然世界是男人的，不属于女人；既然“家”其实也不属于女人，只是女人被困于“家”中——“家”实际上是政权、族权、夫权统治的基本单位，那么，女作家们把改善受压抑的生活境遇的良好愿望寄托于某个“善良”的家长身上，恐怕是最通常的想法了，斯陀夫人和莫里森便是如此。

第二，故事的核心。两部作品的第二处互文是，在黑奴逃亡的这条线索中都以一个年轻的母亲带（怀）着孩子在惊险中出逃并绝处逢生为核心情节。

在《汤姆大伯的小屋》中，最动人的情节就是黑人奴隶伊丽莎抱着孩子在浮冰上飞奔。当得知自己年幼的儿子要被卖掉时，她做了与汤姆大伯截然不同的选择——带着儿子逃亡。途中，一条大河挡住了她的去路，后面黑奴贩子又在紧追，生死攸关时，她奋不顾身地抱着孩子踏上了河上面的一块块浮冰：

追兵就在背后；她鼓足全身力气——一个人在生死关头得自神明的那种力气——一声狂号，纵身越过岸边的湍流，跳到河面的冰块上。这真是铤而走险的一趟——只有疯子或是亡命者才有可能这样做；她跳下河时，海利、山姆和安第都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惊呼起来。

她的脚一落下，底下绿色的大冰块立刻就吱吱作响地摇晃起来，可是她一分钟也不停留，

① 哈里叶特·比彻·斯陀夫人：《汤姆大伯的小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② 托妮·莫里森：《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③ 《宠儿》，第174页。

④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674页。

一面尖声狂叫,一面使出全身的劲儿来,从一块又一块浮冰上跳过去,摔了跤又蹦起来,滑一脚还是向前跳!鞋也掉了——袜子也划破了——所过之处,血迹斑斑……^①

黑人母亲、孩子、大河、追兵,这就是上述这段文字中的四个关键词,由此串联起一个黑人母亲带着孩子艰难逃亡的过程。

在莫里森的《宠儿》中,也有近似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主人公塞丝肚子里怀着未出生的孩子拼命地逃亡,路上几近死亡,被白人姑娘爱弥救助后,她拼命地逃到了一条大河边。就在她担心追兵赶到而自己又无力过河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孩子要出生了,于是,她拼命跳上大河边的一条小船上:

婴儿卡住了。它脸朝上,让妈妈的血淹没了,爱弥停止祈求耶稣,开始诅咒耶稣他爹。

“使劲!”爱弥尖叫道。

“拽呀。”塞丝低声说。

那双有力的手第四次发挥威力了,但不是立竿见影,因为河水从所有窟窿里钻进来,漫过了塞丝的屁股。塞丝的一只手伸到背后,一把抓住船缆,同时爱弥轻轻地钳住了脑袋。当河床里露出一只小脚,踢着船底和塞丝的屁股时,塞丝知道完事了,就允许自己昏迷了一会儿。^②

如果我们也在这一段文字里找一下关键词,同样——黑人母亲、孩子、大河、追兵,一样都不差。

斯陀夫人的笔墨集中在伊丽莎的“母”性上,莫里森同样关注了塞丝的“母”性,显然,“母”性是这个层面上互文的关键所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便要注意到,因为“孕产”是女人在人类生命传承过程中经历的特殊过程,所以女性的“母”性情结已是一份集体无意识。

关于这一点,女性主义理论家贝蒂·弗里丹曾有过论述:“男女除了在生产下一代的方式上有所区别以外,他们之间并无差异。”^③也就是说,生产下一代的方式是男女的唯一区别。这唯一的区别对女性来说当然是最深刻的记忆,这份记忆是性别的集体传承,即使某一个女性个体尚未进入到孕产的特殊时期甚至还处于孩童时代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传承依然是存在的。由于生产过程的决定,由于母体与新生儿之间鲜活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父体与新生儿之间是不存在的),所以,女人与被生产者(孩子)之间的亲密度在通常情况下是至高的。显然,“孕产”对女人来说,是永恒的记忆。“孕产”情结的集体无意识在女性作家这里便会出现令人刻骨铭心的“母”性书写。

第三,故事的关键。两部作品的第三处互文是,在女主人公逃亡的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都出现了一个男人对女黑奴的救援,于是,女黑奴眼前的灾难暂时化险为夷了。

在《汤姆大伯的小屋》中,伊丽莎带着孩子在河面上的一块块浮冰上飞奔——

最后,仿佛做梦似的,她隐隐约约看见了俄亥俄州的河岸,有一个男人过来扶她上岸。

“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这个女人可真有胆量!”那个汉子赌了个咒说。^④

在《宠儿》中,刚刚生下孩子的塞丝一个人抱着婴儿准备想办法过河——

她疲惫不堪,就呆在那里,照进眼睛的阳光让她头晕目眩。汗水在她身上哗哗流淌,彻底浸湿了婴儿。她肯定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因为她再睁开眼的时候,那个男人站在她面前,手里已经拿了一块热腾腾的炸鳝鱼。^⑤

为什么两个文本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男人的救助?可以说,支撑这个互文现象的是女性生存历史中的“弱者”地位。西蒙娜·德·波伏娃为什么称女性为“第二性”?因为她们的前面有男人这“第一性”,社会地位的排序已经将女人置于依附地位,所以,居于困境下的“弱者”怎可能不受到“强者”救助?

莫里森和斯陀夫人的这段互文情节不免令人想起了“英雄救美”。“英雄救美”虽然似乎充溢着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但它明显的是男权统治下的社会话语,“男人”为“英雄”,“女人”为“美”,一个“救”

①《汤姆大伯的小屋》,第55页。

②《宠儿》,第99页。

③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④《汤姆大伯的小屋》,第55页。

⑤《宠儿》,第107页。

字就已表现出了社会的权利意志偏向——对男性而言，这里强调的是“英雄”行为；对女性而言，表现的则是对男性的依赖。这种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地植于千百年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莫里森与斯陀夫人的文本尽管将“英雄”和“美”的指数都做了削减，但她们笔下的社会历史真相没有变：强者依旧是强者，弱者依旧是弱者。

第四，故事的线索。两部作品的第四处互文是，小说中都铺设了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女黑奴的携（怀）子逃亡，另一条是男黑奴的辗转被卖，而同样都是将女黑奴携子逃亡的线索写得熠熠生辉。

在《汤姆大伯的小屋》中，逃亡这条线索上的主要人物是女黑奴伊丽莎和她的儿子。伊丽莎是谢尔贝夫人房里的黑奴，当听到自己的孩子要和汤姆大伯一起被卖时，她毅然地抱着孩子逃亡。另一条线索上的主要人物是老黑奴汤姆。汤姆从伊丽莎口中得知自己已被主人卖掉时，他选择了听命：“他靠在椅子背上，两只粗大的手掩着脸，以低沉、嘶哑的声音剧烈地呜咽着，以致椅子都为之震动起来。”^①他被卖后又经转卖，受尽了折磨，最后死在了一个暴戾的庄园主手中。

莫里森的《宠儿》几乎是同样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女黑奴塞丝怀着孩子的拼命逃亡；另一条线索上的男黑奴保罗·D两兄弟当时没有出逃，只想等待时机，其结果却根本没有逃出来，一个被处死，另一个被转卖，受到非人的折磨，险些丧命。

这里的问题是，《宠儿》不仅有《汤姆大伯的小屋》中的两条类似的线索，而且作者也像斯陀夫人一样，赋予了女黑奴逃亡的这条线索以异常的光彩，原因何在？

这自然可追溯到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的抗争心理。“次要者”是历史赋予女人的身份，而因为种族歧视，黑人女性更是被视为“次要者”中的“次要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疾呼：“女人为什么没有对男性主权（male sovereignty）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②是的，被历史置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不会永远地自愿地认同做历史的“他者”。女作家在文学领域中的崛起，本身就是在逐渐地改变女性在文坛上的“他”者地位，那么，她们笔下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文本中变女性形象的边缘身份为中心身份，促其“他”者地位的改变。莫里森与斯陀夫人的作品与男性作家马克·吐温的同类题材作品《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相比较就很可能可以说明问题。后者在人物的安排上是忽视女人的，无论是老黑人吉姆的逃亡，还是哈克贝利·芬的助其逃亡，仿佛一切都是男人的事。两位女作家则不同，她们在线索的对比中将笔墨和情感向女性倾斜，更是将黑人女性向“中心”推进，这明显地是在消解边缘与中心的界线。尽管也有相当多的男性作家将女性置于他们文本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莫里森与斯陀夫人这样的女性作者与其不同，这是女作家以主体的身份在文本中还女人的主体性。

综上所述，莫里森的《宠儿》与斯陀夫人的《汤姆大伯的小屋》之间互文性关系的出现，是女性文化潜在支撑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的深刻启示是，“互文性”可以是共同的文化基因使然。莫里森与斯陀夫人作为女人，她们的创作都传递出了根植于女性生存历史而形成的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若干信息，致使她们在显露创作个性的同时，又明显地留下了“互文”的痕迹。

这个启示对我们研究“群”作家或“类”作家是有进一步的启迪意义的。“群”与“类”本身已经具有了潜在的相通性，所以，“群”作家或“类”作家之间的“互文性”便很可能成为挖掘“群”与“类”特征的突破口，并在相互作品内涵的解读时，彼此成为有价值的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的文本关系研究，为互文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视野。

● 作者简介：肖淑芬，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 扬州 225002。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汤姆大伯的小屋》，第36页。

②《第二性》，第13页。